

【动态与综述】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综述

刘 江

【摘 要】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其所具备的学术与现实的多重意义使得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倍受学界关注,而且争议问题持续出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充分反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与研究趋势,展现近代史研究中的正确导向与多种声音,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致力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果,力求全面、客观地呈献给学术界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深度展示了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据统计,来源期刊与2016年者基本持平,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内容则在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这三个领域有所偏重;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科院系统及高等院校,重点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与以往相比,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基本格局变化不大,但一些综合性刊物有进一步加强刊发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倾向。从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论文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一些新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不断深入,近代史上的农战史研究有复苏迹象;新选题、新领域的探索取得明显进展;对晚清史研究的多角度反思明显加强;发挥史学求真和致用功能,在近代史研究中关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对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收获等。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实现了既定目标。

【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

【作者简介】刘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4~138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中国史学各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学科之一。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比如研究材料更为丰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理念更趋多元,因此使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在对该年度发表的数量可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术论文作全面采撷、系统研读的基础上,选择、转载了其中相当部分有代表性或高水准的优秀学术论文,力求全面、客观地呈献给学术界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深度展示了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本文试以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为统计样本,对所转载的论文及刊载

论文的期刊、论文作者等方面的情况作系统的分析总结,从转载数据各项指标分布、转载论文的课题选择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对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提供更为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依据。

一、转载的基本情况

2017年度,公开发表在各类杂志报纸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文章共计1475篇,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共转载130篇,涉及69种刊物,转载率为8.81%。与2016年相比,该数据与转载文章数量大致相同(2016年转载135篇,涉及66种刊物)。相较于复印报刊资料历史类其他专题的转载情况,《中国近代史》的转载量和转载率是比较高的。具体来看,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文章内容

包括:政治史研究33篇、经济史研究18篇、社会史研究25篇、思想文化史研究34篇、近代人物研究14篇、历史文献学2篇、动态与综述4篇。2016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文章的内容包括:政治史研究27篇、经济史研究23篇、社会史研究20篇、思想文化史研究31篇、近代人物研究20篇、历史文献学4篇、动态与综述10篇。由此可见,2016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文章所涉内容所属领域比较平均,2017年转载文章内容则在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这三个领域有所偏重。

1. 期刊转载情况

据统计,复印报刊资料在2017年《中国近代史》转载的130篇文章中,有51篇来自于高等院校主办的学术刊物,有64篇来自于社科院(联)主办的学术刊物,这两类学术刊物刊发的文章占了转载文章的绝大多数。

历史研究专业刊物如《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研究》《史林》等,转载量仍靠前仍属意料之中,且与2016年的转载量基本持平;一些综合类刊物,因大都有着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基本每期都会有相关文章,有的期刊还设有固定的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专栏,有针对性地集中关注某些学术问题,因此转载量也较大,在这类刊物中如《学术月刊》《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与2016年相比,转载量有所增加(详见表1)。

2. 第一作者来源情况

在2017年《中国近代史》转载的文章中,文章的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科院系统及高等院校,重点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北京地区的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居多,其文一共转载18篇,其他来自北京大学的作者文章有10篇、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作者文章分别有4篇。上海地区的作者含复旦大学的文章7篇、华东师范大学的文章4篇、上海大学的文章4篇等。来自广州的作者的文章主要是中山大学8篇、暨南大学1篇。来自武汉的作者的文章主要是华中师范大学有4篇。与2016年相比,转载文章第一作者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11篇增至18篇,增加篇数达7篇之多;来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作者文章共转载8篇,而在2016年该单位作者的文章转载量仅为1篇,增加篇数亦达到7篇,增幅最为突出;2017年来自上海

表1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期刊转载量(率)排名

报刊名称	刊期	转载数	发文数	转载率%	排名
《近代史研究》	双月	12	63	19.047619	1
《史学月刊》	月刊	8	186	4.301075	2
《历史研究》	双月	5	69	7.246377	3
《学术月刊》	月刊	6	205	2.926829	4
《史林》	双月	5	123	4.065041	5
《南京大学学报》	双月	4	86	4.651163	6
《清史研究》	季刊	3	48	6.250000	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季刊	3	71	4.225352	8
《安徽史学》	双月	3	119	2.521008	9
《中山大学学报》	双月	3	121	2.479339	10
《抗日战争研究》	季刊	2	47	4.255319	1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双月	3	139	2.158273	12
《社会科学研究》	双月	3	152	1.973684	13
《广东社会科学》	双月	3	172	1.744186	14
《社会科学战线》	月刊	3	430	0.697674	15

大学文学学院的作者的文章转载量是4篇,2016年是2篇,增加2篇(详见表2)。

综上所述,与以往相比,20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格局变化不大,在基本维持原有格局的情况下,一些综合性刊物有进一步加强刊发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倾向。在研究人员成果分布方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其雄厚的研究实力,使其研究成果被转载的数量又有大幅增加,继续名列前茅;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成果的转载数量较之以往取得明显突破,说明该单位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展明显。

二、转载论文内容呈现的学术特点

从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论文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一些新的特点。

1. 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不断深入,近代史上的农战史研究有复苏迹象

通过继续挖掘资料,2017年度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如王涛《天险变通途: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作者认为英国通过对中国近海海域、河口和内河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实地调查,加深了对中国的这些具有重要军

事意义的区域的地理认知,由此影响到英国在鸦片战争时期对其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部署及其战略战术计划的实施,这是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邱涛《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中国近代史》第8期),通过对史料的深入辨析,对甲午战争中的一“定案”再作审视,对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如叶志超、依克唐阿、徐邦道等人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近年中外关系史研究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有些史实还较模糊,仍待厘清。葛夫平《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中国近代史》第7期),利用中外资料,对第二次四明公所案发生的背景和经过、中法之间的交涉、英法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以及上海法租界扩界关系等问题做了一系列深入的考察和分析,究明了基本史实。在中外关系史中,中英之间的关系相较于近代英国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仍较薄弱。“二十一条”的研究学界虽已有较多关注,但侯中军《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国近代史》第5期)一文,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就英国与中日之间“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要求展开了深入探讨,分析了英日之间的纠葛和交涉过程及第五号要求最终被撤除的结果,深化了“二十一条”的研究内容,也体现了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关于“二十一条”的研究,还有尚小明

表2 2017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作者单位排名

作者单位	转载量	排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8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8	2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5	3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4	4
上海大学文学院	4	4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4	4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4	7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	8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	9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2	9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	9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	9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	9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	9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	9

《“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史》第5期)一文,探讨了总统府在“二十一条”交涉活动中的导向及作用。相较于中朝关系、中日关系,中越关系研究还有待加深。章扬定、倪腊松《“越南问题”与19世纪中后期清廷的处变策略》(《中国近代史》第1期),揭示了清廷内部对于既牵涉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近代中国与列强关系的越南问题的认识、态度及主张的复杂心态。有的学者利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外关系史,拓展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维度。屈文生《笔尖上的战争:〈望厦条约〉订立前顾圣与程裔采间照会交涉研究》(《中国近代史》第12期),利用中外文本比较和文本翻译的方法,剖析《望厦条约》签订前程裔采与顾圣之间的照会,细致反映了中外之间的复杂交涉。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曾经受到史学界的格外重视,然而近几十年随着学术语境的变化,此类研究已明显被冷落。2017年有学者又重新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这是值得重视的研究动向。如刘晨《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对天京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等若干关键点都作出了自己新的判断和分析,并认为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来定位,因为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不宜简单地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标志,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王蒙《“从番”还是“从古”:对太平军礼拜日的考察》(《中国近代史》第12期),具体分析了太平军礼拜日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强调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西冲突所带来的异质感,但隐藏在中西冲突背后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却是太平军始终无法克服的难题。

2. 新选题、新领域的探索取得明显进展

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不断受到重视,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影响,在新的研究选题、新的研究领域方面都有明显进展。温震军、赵景波《“丁戊奇荒”背景下的陕晋地区狼群大聚集与社会影响》(《中国近代史》第9期),从当时特大干旱引起的狼群迁徙的异常行为

切入,对草原环境和农耕环境的变化、狼群聚集和活动的原因以及狼群异常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关于丁戊奇荒,已有很多学者从灾情发生的原因、特征、赈灾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做了探讨,该文从狼群聚集的角度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视角独特。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利用新发现的档案文书,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阐述了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两县分别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由册书把持的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反映了受民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所发生的变化过程。利用地方档案进行研究的还有周琳的《一个垄断商人群体的机缘与形成——基于咸丰至光绪时期〈巴县档案〉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第5期),同样是利用《巴县档案》,以“亲历者”的视角,考察了重庆的商人群体——牙行通过代收厘金强化贸易的案例,这既是具体厘金征收的个案研究,也属于对特殊人群的探讨。邵雍《晚清海盗述论——以〈申报〉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第8期),利用《申报》材料,勾勒了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为晚清海盗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近代社会因外国列强入侵,传统的县令权责和职能与历史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外如何应对列强、对内如何应对上级及调和民众关系等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马陵合《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中国近代史》第8期),分析县令在高密铁路案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呈现了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研究视角的转换,使得一些以前不被重视的历史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任吉东《近代中国城市粪溺的治理——以天津为例》(《中国近代史》第7期),以天津为例,探讨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天津如何制定规章制度、设立机构和专职人员将粪溺纳入社会管理的研究,这既属于卫生史的范畴,也属于城市近代化转型的研究。近代的船运史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如龚缨晏《中国第一艘轮船的由来》(《中国近代史》第7期),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厘清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的由来历史。

疾病医疗卫生史是近年研究的一个亮点,有不少成果问世,对药物与文化交流、医药技术与观念和制度、医疗团体与东西方医学交流等方面都有研究。陈明《〈西药大成〉所见中国药物的书写及其认知》(《中国近代史》第11期),梳理了书中所提及的在华调查的西方人、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药物等,认为研究中医药知识应放到东西交流网络中来辨析其自身角色、地位和影响,并得出中医药在以现代西医为主体的世界医学网络中开始边缘化的结论。关于西医技术的引进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探究。李彦昌《剂型、技术与观念——片剂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史》第11期),对药品片剂的起源与技术改进、片剂的在华传播与名称选择、片剂的中西医比较、剂型与服用体验、技术引进与本土化生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释。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近代东亚西医学的一体化发展(1886-1932)——基于〈博医会报〉相关报道的分析》(《中国近代史》第8期),从东西方医学交流互动的视角,对中国的博医会进行了宏观系统的历史考察。

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趋向之一,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国外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影响所致,也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寻求近代史研究出路、拓展近代史研究领域过程中的有益尝试。

3. 对晚清史研究的多角度反思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最为复杂的阶段,对晚清历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近年来有鉴于此的研究较为薄弱,就如何推进、拓展晚清史研究,2017年学术界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如崔志海《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回顾了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三个阶段的晚清史研究状况,并就如何探索近代史和清史的融合、客观理性看待百年来个案研究流派和研究范式、努力寻求政治与学术统一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朱浒《晚清史研究的“深翻”》(《中国近代史》第10期)一文,建议从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存在的研究误区、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在运用上的局限两方面进行“深翻”式研究。

吴义雄《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中国近代史》第10期),针对近二三十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相对沉寂、研究进展缓慢的客观现实,建议中外关系史研究应从国史、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三个视角深入研究,并指出目前这三个方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缺憾。王栋《新时期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第9期),主要关注的是中外关系史领域里1970-1980年代和2000-2010年代这两个时段中历史学家的学术贡献,包括研究的大叙述和主议题、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理论问题、新题目和新争议等。

对晚清史研究的重视,意味着晚清史研究将出现新的发展机遇;而晚清史研究如果能够取得明显进展,则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将产生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4. 发挥史学求真和致用功能,在近代史研究中关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

2017年6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实际控制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与我方军队在我国领土内长时间对峙。因此,厘清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由来与法律依据就显得尤为必要。曾皓《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由来与法律依据——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的国际法律责任》(《中国近代史》第11期),厘清了相关史实,指出印度非法越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条约,印度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城市人口是当下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控制北京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是今年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研究历史上北京人口演变情况对当今无疑有重要借鉴意义。王建伟《清末民初北京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人口问题》(《中国近代史》第8期),探讨了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引发的人口变动、密度、性别比例与年龄结构、阶层分化与空间区隔等问题。这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以致当今北京人口的管理有一定借鉴作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学界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日本学者松浦章《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史》第3期),鉴于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着眼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对轮船招商

局和日本邮船公司的航运情况,以及轮船时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分析。

5. 对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新收获

长期以来,孙中山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显学”,2016年恰逢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学界纷纷撰文纪念,很多成果在2017年初的刊物上呈现。桑兵《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中国近代史》第4期),梳理了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上与在京逊清皇室的交往过程,也论述了清皇室对中国安定大局的考虑,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赵立彬《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中国近代史》第4期),剖析了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对各类名誉事件的反应和应对事实。此外还有张华腾的《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中国近代史》第8期)、雷平的《1912年孙中山访鄂史事考论》(《中国近代史》第6期)等文章,观点、内容都各具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逐渐改变了以往全盘否定的模式,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客观深入研究阶段,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如近年来的学术评价中出现了“捧袁贬孙”的现象。曾业英《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吗?》(《中国近代史》第8期),对近代史研究中一些人刻意美化袁世凯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商榷,用史实辨析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及意图。马勇《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诸问题》(《中国近代史》第5期),通过排比新旧史料,在分析了袁世凯“开缺”的真相是在安心养病、操持实业的同时,也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联系的真实情况。

除了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研究,对其他近代史人物的研究还有陈阳《宋育仁“封建论”的“地方”与“天下”》(《中国近代史》第9期)、张建斌《端方与东沙岛交涉——兼补〈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不足》(《中国近代史》第9期)、韦明《文祥“出入夷(营)”考辨》(《中国近代史》第9期)等文章,新观点、新内容竞相呈现。

三、结语

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

领域,其所具备的学术与现实的多重意义使得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倍受学界关注,而且争议问题持续不断地出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充分反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与研究趋势,展现近代史研究中的正确导向与多种声音,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致力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2017年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标。从《中国近代史》专题刊中我们看到,20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坚守以往已经有了相当研究基础的老问题的同时,不仅还有新的开拓进取,而且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等方面也都出现了若干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同时,鉴于中国近代史学科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史学与时代紧密相关、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人物评价更客观公正等方面也更加受到学者的关注。我们还注意到,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经常出现的因追逐某些“热点”问题致使研究者“蜂拥而至”的现象,在2017年有所缓解,这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课题意识和选题角度方面更趋理性,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当然,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民国热的兴起,许多学者研究领域下移,开始转向民国,晚清史研究显得愈发冷清;除了少数重大问题有所拓展和深化、具体研究成果不断积累外,大部分问题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入;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状况仍然十分明显,研究成果以具体研究、微观研究为主。这一方面说明学者们多关注于自己个人的研究领域,而整体性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模式还尚待学界努力构建;另一方面,对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仍然存在一些混乱认识,更需要学者通过科学的学术研究去明确或澄清。另外,加上近代史研究资料的大批涌现,如何认真辨析旧史料、挖掘新史料,对已有定论的史实进行重新解析,如何处理老问题和新领域及如何摆脱“碎片化”的学术研究倾向等,也都需要进行宏观、理性的反思,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今后应注意思考和努力的方向。